

意识

中  
识“中华  
族共同体  
从民族角

本

分布地域上存在巨大差异。据 2021 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 8.89%,少数民族地区占地面积达我国版图的 60%左右,汉族人口仅占 91.11%。<sup>①</sup> 这一巨大反差和不平衡是由历史造成的,也与地理环境有关。我国的辽阔疆域和众多民族中,无论是人口数量庞大的汉族

朝治下的民众，“汉人”称谓便逐渐兴起和流行。<sup>①</sup>从史籍记载看，“汉人”称谓的流行主要在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因该称谓简明通俗，易于传播，从南北朝到隋唐以后，一直延续到清代，“汉人”始终成为对中国主体人群使用最广泛的一个俗称。<sup>②</sup>近代，因“民族”概念的传入，加之清朝解体后确定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建国方略，“汉人”称谓逐渐被“汉族”所替代。<sup>③</sup>这便是今天“汉族”的由来。

历史上，“汉人”是一个相对宽泛、模糊的概念，其内涵也不断发生变化。例如，单以狭义的“汉人”即汉朝治下的人而言，春秋战国时的秦人、楚人、吴人、越人，都曾被视作“蛮夷”，<sup>④</sup>秦人中更包含和吸纳了大量“戎人”成份，<sup>⑤</sup>但在秦汉统一后，他们都被纳入汉朝治下，成了“汉人”。两汉时期大规模开疆拓土，北击匈奴，东北征服朝鲜，经营西域，开西南夷，南灭南越、闽越，开拓南越与岭南之地，把诸多周边民族直接纳入汉朝治下。东汉时期，南匈奴归降汉朝后，大量匈奴人被安置在今山西、河北一带，定居务农，与汉人杂处，大多逐渐融合到“汉人”之中。<sup>⑥</sup>

从十六国及南北朝持续近 400 余年的南北民族大融合使胡汉界线渐趋模糊。贾敬颜指出：

纵观十六国、北朝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北方及西北少数民族大量进入黄河流域，他们与汉人杂居相处，互相交往，出现了民族间的大吸收，大融合，而其总的趋势则是化入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经十六国、北朝以后，汉人的内容复杂了，



合的道路。明人顾炎武称“今代山东氏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sup>①</sup>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变革旧制,令衣冠如唐朝,“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sup>②</sup>这些强制改变胡俗、胡姓的措施,加快了明代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的融合。洪武九年,淮安府海州儒学正曾秉仁上疏称“臣近来窃观蒙古、色目之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仕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sup>③</sup>对此,顾炎武曾站在汉文化立场感叹道:“华宗上姓与毡裘之种相乱,惜乎当日之君子徒诵‘用夏变夷’之言,而无类物辨物之道。”<sup>④</sup>故有明一代,散布于明朝统治区内的许多蒙古人、色目人通过改胡俗、改汉姓,与汉人杂处并相互通婚,逐渐变成了“汉人”,使汉人的构成及其外延得到进一步扩展。

清朝是满人入关建立的王朝,其民族等级是满、蒙、汉。尽管在清朝前期满族统治者为防止汉人对满人的同化,采取了诸多限制与防范措施,但在清朝结束进入民国时代,绝大多数满族均被划入或融入“汉人”之中。<sup>⑤</sup>

从民族角度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显著事实就是“汉人”的壮大。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农耕人群尚以“华夏”自诩,并以此来与周边“夷狄”“蛮夷”相区分,那么,在十六国和南北朝尤其是隋唐以后,随着“汉人”群体的扩大,“汉人”开始取代“华夏”,成为一个更宽泛、更庞大的民族实体和概念。所以,“汉人”的壮大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主流。自秦汉以降,中国的整体性与共同性,很大程度正是通过“汉族”形成与发展得到充分体现。有鉴于此,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是阶段性的:

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第一步是华夏族团的形成,第二步是汉族的形成,可以说是从华夏核心扩大而成汉族核心。……汉族形成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凝聚力的核心,开始向四周围的各族辐射,把他们吸收成汉族的一部分。从“华夏”到“汉人”,再到近代的“汉族”以及“汉族是中国凝聚核心”,这是费孝通基于中国历史客观事实做出的准确判断。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23《二字姓改一字》,中华书局影印本2011年版,第883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30洪武元年二月,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版,第525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109洪武九年,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09页。

④ 顾炎武《日知录》卷23《二字姓改一字》,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9册,第884页。

⑤ 1936年郭维屏《满族同化》,《中央日报》,“满族同化”为汉族同化,所谓满族,几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反映出民国时期“汉族同化”的客观事实。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发展史》,发行者冯月樵,成都球新印刷厂印,1989年。

⑥ 费孝通《中华民族发展史》,《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5-7页。

## 二、“汉族”是融合出来的民族,其复合性和巨大包容性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

历史上,“汉人”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这导致汉族的构成相当复杂。那么,我们应如何认识“汉族”这一庞大共同体的特点与性质?

首先,历史上的“汉人”即今天所言的“汉族”主要是融合出来的民族。对此,学界已有高度共识。贾敬颜《“汉人”考》指出:“汉民族是全世界最大的民族。这个巨大的人们共同体系数千年来由许多民族汇合而成。”<sup>①</sup>费孝通也指出:“汉族的壮大并不是单纯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更重要的是靠吸收进入农业地区的非汉人。”<sup>②</sup>顾颉刚云:“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sup>③</sup>陈连开也指出:“汉族始终是在吸收、涵化众多来源的族人和优秀文化实现大融合中形成、发展、壮大的。”<sup>④</sup>汉族的形成与壮大在于对众多民族成份的吸纳与接受,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汉人”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产物,是融合出来的民族。如果说“民族为历史之主脑”,<sup>⑤</sup>那么汉族的形成正是历史上民族融合产生的最大“果实”。

历史上“汉人”为何能源源不断地吸纳和接受其他民族成份?“汉人”是靠什么“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始终源源不断有新的民族成份加入,每当有新的民族进入并建立起新的王朝或政权之时,前朝治下的人往往就笼而统之地被归入模糊性极强的“汉人”序列之中。如此轮转递续,使“汉人”这一群体得以不断壮大。例如,十六国、南北朝时所有进入中原与汉人杂处的北方民族,经过隋唐大一统之后,其同汉人的界线逐渐模糊、消弭。到了宋代,他们便理所当然地被归入到“汉人”这一庞大人群之中。又如,辽朝时,契丹人、汉人、渤海人三者尚有一定界线和区分,但到金取代辽以后,辽境内的汉人、渤海人和契丹人,均一概被归入“汉人”行列。到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以后,“汉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契丹人、高丽人被归入“汉人”,就连大部分的金人(女真人)也被归入到“汉人”之中。清朝统治时期,满、汉之间尚有较明确的界线与区分,但清朝灭亡后,满、汉界线就趋于模糊和消失。到民国时期,所有生活于内地并与汉人杂处的满人都被归入“汉人”行列,在心理与认同上也逐渐融入“汉族”之中。

所以,“汉人”这一称谓和概念的模糊性、笼统性及由此带来的“低门槛”,赋予“汉人”群体以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其能够源源不断地吸纳和接受众多民族成份,能够最大限度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第二,定居与农业经济生活方式,既使“汉人”具有极强稳定性、延续性,并成为汉人消解其与北方民族文化差异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汉人得以壮大的另一关键原因,在于其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则来自该人群主要从事农业经济。恰如费孝通指出:

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sup>①</sup>

这是对汉族凝聚力的一个洞见。农业不但是汉族,事实上,也是中华民族得以孕育、形成和发展的根基。

考古学家严文明曾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说。他依据新石器文化的分布和内涵,将中国早期文明划分为三个大的区域——以中原文化区为中心的旱地农业区、长江以南以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为中心的稻作农业区以及中原旱地农业区西部和北部外围地区的狩猎采集文化区。<sup>②</sup>数千年来,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民族交融,汇聚始终围绕以中原旱地农业区和长江以南的稻作农业区为中心地域来进行。旱地与稻作这两大农业区的并列与相互依存,不但构成了中华文明发展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也是以农业为生计方式的“汉人”群体得以形成、发展并不断壮大、绵延之根本。同时,农业经济也是历史上“汉人”抵御、化解来自狩猎采集文化区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并赖以消弭其民族与文化差异的主要方式和手段。这突出表现于两点:

<sup>①</sup>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

<sup>②</sup>

1. 每当北方民族大规模南下, 中原地区遭受巨大冲击时, 中原地区从事旱作农业的人群往往选择向长江以南稻作农业区迁徙, 以此来抗御和消解北方民族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压力。因长江以南地区是稻作农业区, 而且是粮食产量更高、更富庶的稻作农业区, 使中原移民能很快跟上南方农业区的节奏和脚跟。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唐安史之乱以及辽宋夏金和元朝时期, 中原移民大多选择向长江以南稻作农业区迁徙的方式, 来规避、消解北方民族带来的冲击与压力。另一方面, 隋唐时期, 中原作为庞大的政治中心和人口稠密区, 粮食与税收均离不开南方富庶的稻作农业区的支撑, 所以, 正是中原旱作与南方稻作两大农业区并列, 正是中原旱作与南方稻作两大农业区并列及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支撑, 才赋予中华文明极强的稳定性、延续性, 也赋予以农业经济为根基的“汉人”群体以极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 并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始终以两大农业区为依托。毫无疑问, 中原旱作、江南稻作这两大农业区的互补与相互依存、相互支撑, 为“汉人”群体在地理地域上所提供的巨大回旋空间, 赋予“汉人”群体以极大的稳定性和韧性, 成为“汉人”能持续发展、壮大的重要依据。

2. 北方民族一旦在中原或农耕地区立足, 就不得不选择与汉人杂处、定居和农耕经济生活方式, 假以时日, 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农耕经济生活和汉文化熏染, 逐渐融入“汉人”之中。定居与农业经济生活方式, 亦成为汉人消弭其北方民族文化差异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初年, 南匈奴降汉, 东汉朝廷将其大量安置于山西、河北至宁夏一带, 让其与汉人杂处。东汉末年和三国战乱之际, 这些成份复杂的匈奴降部, 逐渐播迁整个华北地区。永嘉之乱占据中原建立政权的“五胡”大都出自于此。他们能够立足中原, 一是逐渐从事农业, 二是如钱穆所言“诸胡杂居内地, 均受汉人之教育”。<sup>③</sup>

观时, 东突厥降唐, 唐朝朝臣议论其安置时即称“因其归命, 分其部落, 各徙于内属州县, 各使耕田, 变其风俗, 百万胡虏, 可得化而为汉, 则中原之患, 永空矣。”<sup>④</sup>从钱穆所言“诸胡杂居内地, 均受汉人之教育”, 不仅深知“耕田和同汉人杂处之‘定居’生活可让胡人逐渐汉化, 且有化解和消弭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文化差异之功效”, 且唐太宗完光武帝安置匈奴的办法, 将归降的东突厥安置于内属州县, “既全其部

① 全汉昇《唐帝国与运河》,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第 32 页; 史念海《中国的运河》,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48-209 页。

② 《旧唐书》卷 89《高祖本纪》,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第 2940-2962 页。

③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修订本》,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第 254-261 页。

④ 《旧唐书》卷 61《高祖本纪》,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第 2361 页。



落 得为捍蔽 又不离其土俗 遂处降人于朔方之地 其入居长安者且万家。”<sup>①</sup>使突厥人的汉化成为唐朝北方民族汉化的一个代表。

历史上 中原王朝将归降内附的周边民族、部落安置于其统治疆域内的例子不胜枚举。梁启超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地广人稀 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 徙置之结果 能增加交感化合作用。”<sup>②</sup>历代中央王朝屡屡将归附之周边民族安置于农业区与汉人杂处 所起作用正是民族与文化间的“交感化合”。

历史上 北方游牧民族融入“汉人”是一个普遍现象。由于农业经济的稳定性远远强于游牧经济 所以 以游牧经济为特点的北方民族融入定居和从事农业经济的“汉人”之中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流。此即梁启超所称“甲时代所谓夷狄者 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sup>③</sup>

第三，“汉人”是融合出来的民族 其复合性特点赋予“汉人”以极大包容性。

最能说明汉人包容性的一个例子 是北宋真宗年间曾有一支犹太人迁徙到开封 后逐渐融合于汉人之中。<sup>④</sup> 犹太人很早失去祖国 流散于欧洲及世界各地。但迁徙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大多仍能保持自己的信仰与认同。唯迁入中国的犹太人却渐渐融合到“汉人”之中。根本原因在于汉人对外来民族十分包容 排斥较少 因感受不到民族与文化上的排斥和压力 自身的认同就渐渐松弛 加之同汉人杂处并相互通婚 遂融入“汉人”之中。关于“汉人”的包容性 谭其骧指出：

汉民族自古以来 只以文化之异同辨华夏 不以血统之差别歧视他族。凡他族之与华夏杂居者 但须习我衣冠 沐我文教 即不复以异族视之 久而其人遂亦不知其为异族矣。故汉民族同化异族之能力 极其伟大。<sup>⑤</sup>

我以为中国在一个国家里 汉族在一个民族里 一贯对待不同文化采取共许共存共容的态度 不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是如此 因此儒佛道三教得以长期并存 进一步又互相渗透 同时又能接受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 这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性 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sup>⑥</sup>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不难观察到一个显著事实：在我国 56 个民族中 汉族的民族观念及民族界线是最淡薄的。

的民族地区  
藏公路,因  
途中却有一  
车辆提供开  
落,往往都能  
各个偏远之  
上民族界线  
从很大程  
聚”作用的原  
认识和理解其

### 三、汉族与少数民族

为什么说汉  
第一,今天的  
可以毫不含  
说,今少数民族先  
与少数民族之间有  
少数民族同属中华

汉人是许  
化体质的杂糅  
了。……汉人体  
北方人谁敢  
血统。<sup>③</sup>

汉人的生活方  
谭其骧也指出:

历史上民族之与  
史者皆知今日中国北部  
以此为据,或又引而伸之  
所崇信。殊不知按之史实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②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1937年5月8日。

③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1937年5月8日。

④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1937年5月8日。

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历史关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

为汉人。<sup>①</sup> 东汉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南匈奴曾一次“还所钞汉民男女及羌所掠转卖入匈奴中者合万余人”。<sup>②</sup> 可见汉人流落于匈奴的人口数量相当庞大,这些汉人中有相当部分也充实或融入匈奴之中。

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汉人除迁徙到长江以南地区外,也大量扩散于西北、东北和西南等的少数民族地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汉人逐渐充实或融入当地民族之中。唐高祖李渊曾言“自倾离乱,亡命甚多,走胡奔越,书生不少,中国之礼,并在诸夷。”<sup>③</sup> 指的正是这种情况。所谓“中国之礼,并在诸夷”,正是汉人“走胡奔越”、大量扩散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结果。

多年前,笔者到岷江上游羌族地区调查,在岷江上游最大的萝卜羌寨惊讶地发现,不仅家家堂屋所供牌位均是“天地君亲师”,寨后庙宇所供奉神祀也皆是汉地神祀像系统。完全印证了“礼失求诸野”和“中国之礼,并在诸夷”的古训。在甘青地区普遍存在的“文昌”信仰、青藏高原等地的关帝信仰、将军信仰等等,都无不体现了“中国之礼,并在诸夷”的情形。<sup>④</sup> 这同历史上各个时期汉人大量扩散和迁徙及融入少数民族之中有直接关系。

明代大量汉人移民迁入云南,明末蜀乱和清初“湖广填四川”等,都使汉人大量扩散到西南各少数民族之中。明清以来,汉人很大程度还成为西南诸多少数民族发生交流联系的中介。<sup>⑤</sup> 清代以来,因中央王朝大力经营和开拓康区以及西康建省,也使汉人大量迁入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与当地藏人发生广泛交融。清朝至民国时期进入青藏高原的汉人主要为官兵、商人、垦民和各类工匠,均为单身男性,加之边地遥远,环境艰苦,娶当地藏族妇女为妻遂成为迁入汉人的普遍选择。《西康之种族》曾有如下记叙:(汉人)“官商兵卒,在西康各地,安家立业,娶夷为妻者,尤指不胜计,近今三十年,西康之歧种人(指汉藏通婚所生后代,当地藏语称‘扯格娃’即‘半藏半汉’之谓),已遍布于城市村镇各地,真正夷族,则须深山内地,

地商民,在村镇经营商业者,亦多  
地,也带来汉、藏民族的深度交  
部地区所带来的汉、藏互动与交  
量充实到藏人之中。<sup>②</sup>

散及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大  
孝通指出:

融合研究得不够,特别是对汉人  
到一个片面的印象,似乎汉族

相互依存、相互容纳、相互流动、  
效民族之间并无截然的界线,更  
出发点,也是认识中华民族共同

或对立的思维模式,  
”的关键

济上的普遍定律。正因为如此,汉族与少数民族因所处地理环境不同而造成经济类型的差异,并未带来彼此的区隔,反成为二者相互需要、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一浪又一浪地南下入主中原建立政权,有一个根本原因,即游牧经济的单一性、脆弱性使其本能需要向农业区靠拢,需要借助农业地区富饶的财富和实施农牧产品的交换、流通与互补来发展壮大自己。所以,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互动与交融,从根本上说,是农、牧经济互补的需要所决定的。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类型上存在的差异,同样成为二者经济生活方面相互需要、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重要原因。诚如费孝通指出:

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生活方面可以提出来注意的是,他们之间,特别和汉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历史上汉族凭借其在经济和文化比较国内其他各民族为先进的优势,已经长期深入其他民族聚居的区域,建立了沟通各民族的经济渠道。汉族聚居的商业据点分散在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里。遍布全国,构成巨大的经济流通网络,起着汉族吸收和传播各民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作用,逐年累月地把各民族捆成一个高层次的共同体。<sup>①</sup>

费孝通还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密切联系有如下生动描述: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汉族的大小聚居区和少数民族的聚居区马赛克式地穿插分布;有些是汉人占谷地,少数民族占山地;有些是汉人占集镇,少数民族占村寨;在少数民族的村寨里也常有杂居在内的汉户。所以要在县一级的区域里,除了西藏和新疆外,找到一个纯粹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很不容易的,即使在乡一级的区域里也不是常见的。在这种杂居得很密的情况下,汉族固然也有被当地民族吸收的,但主要还是汉族依靠深入到各少数民族的这个队伍,发挥它的凝聚力,巩固了各民族的团结,形成一体。<sup>②</sup>

汉族主要聚居在农业地区,除了西北和西南外,可以说凡是宜耕的平原几乎全是汉族的聚居区。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商业据点一般都有汉人长期定居。这样汉人就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sup>③</sup>

因此,在现实生活层面,并不存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截然分割及对立。恰好相反,二者乃密切依存、联系与交融一体。

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生活方面相互依存与紧密联系,是构成中华民族共同性

①

造的  
义而言  
和紧密  
中国地  
的传统  
被其暴  
系”正

程中,汉  
成为一  
。严文  
族为主体  
又有众  
的结果  
众多只  
“少数  
的共

族、  
观念相  
同性的认  
差异而带  
思维模式

本  
作  
整

中  
开  
二  
于  
方

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少数民族的时代要求和  
历史责任,也是中华民族和历史的

(作者石, 海部长)

系  
》中  
·新  
《饮》  
一性



on ,  
(1)  
gin  
test  
ion  
as  
e of  
(5)  
sed  
ern

East

**in**

(5)  
th  
r  
p

of  
ia

s

roa

**SHI Shuo( 73)**

Abstract: A crucial aspect in comprehending the commonality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finding an appropriate way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n ethnic group and ethnic minorit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formation , development , characteristics , and features of the Han ethnic group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through a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It posits that the Han ethnic group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are intertwined and interdependent , with elements of both groups present in each other. There is no clear boundary between the two , and their relationship is a close one , both historically and in reality. The Han ethnic group is a product of integration and its composition and tremendous inclusiveness make it the cornerstone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n ethnic group and ethnic minorities , due to their difference in